

國際孫逸仙先生學術研討會的經過及其影響

許智偉

(一) 集會緣起

出生於奧國薩爾茲堡的商人史達尼克(Hermann Stranik 1908-1975)，以販賣化妝品起家。因經營國際性的珠寶生意而發財，且由於環球旅行而接觸到東方哲學，並仰慕中華文化。他曾經與他的夫人瑪麗安娜(Marianne)，合著了一本「我與世界」的書，來倡導世界和平。其中不僅批判了以競爭為特點的西方霸道文化，讚美了以和平為原則的東方王道文化，並且還認為調和東西文化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三民主義，足以解決當前世界之種種問題，而成為引導未來世界之重要思想。

史氏夫婦相繼逝世以後，其遺產捐助出來，在瑞士洛桑，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名為：「Hermann und Marianne Stiftung」。該基金會除了捐款贊助國際人權運動及有關促進世界和平之事務外，還要舉辦促進東西文化交流的國際學術會議。在遺囑中，他指定了最先舉辦的三次會議的地點為：奧國的薩爾茲堡(史氏的出生地)，瑞士的洛桑(總公司所在地)及德國的慕尼黑(史氏祖籍巴伐利亞邦之首府且為曾經留學之地)。同時，史氏崇尚自由民主，厭惡共產暴政，故又遺言不歡迎共黨分子來參加此類會議。至於每次會議的主題則未加限定，任由遺囑執行，自由選擇。基金會乃邀請三個有關大學的政治研究所所長來共同會商，如何召開國際學術會議以實現史氏遺旨。席間，慕尼黑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金德曼博士(Prof. Dr. Gottfried Karl Kindemann)提議：「如果果要提出一種對未來世界具有重大影響之思想作為會議主題，而且這種思想尚未被國際學術界討論過，能使本次集會具有創新之意義者，最好研討孫逸仙博士的學說。如果要使這項會議不讓共黨參加，最好能與反共最早

、立場堅定的中華民國合作。」

由於去年在德國杜塞道夫舉行的歐洲哲學會議中，曾經提到資本主義積弊已深、共產主義則也面臨破產的殘局，未來世界的人類思想究應走向何處？成為大會中最關心的題目。當時便會有人主張，共產主義過去以後的世界，可能是執兩用中的三民主義。何況史達尼克既已在其遺著中，肯定了孫逸仙博士思想的價值，金德曼的建議也就迅被接納。並推金氏利用一九七九年九月來華出席杭立武先生所召集，亞洲與世界社所主辦的「歐亞研討會」時，與我國有關機構及人士接洽。

(二) 籌備經過

為了籌開「第一屆國際孫逸仙學術研討會(Erstes Europäisches Sun Yat-Sen Symposium)」，史達尼克基金會組織了一個三國委員會，以奧國薩爾茲堡大學精神科學院院長魏斯(Prof. Dr. Walter Weiss)為主席，同校政治研究所所長福伯(Prof. Dr. Klaus Faupel)負責總務，瑞士洛桑的律師李步夏(Dr. Herwig Liebscher)負責財務，德國慕尼黑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金德曼負責編排、論文徵集及出席人員的邀請。他為爭取我國學術界的合作，九月來華拜會及接洽，首先致請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擔任主講，因為季陸先生不僅曾任國父秘書，親自追隨 國父革命，為目前碩果僅存的三位曾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元老之一；並且他曾任四川大學校長、台灣大學教授、黨史會主委，講授國父思想，研究革命主義，數十年來未曾間斷，為革命理論及近代史的權威學者。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季陸先生在內政部長任內實施土地改革，推行地方自治及倡導會議規範(民權初步的法律

化)。在考選部長任內，確立考試制度。在教育部長任內，推行科學教育及民族精神教育，並且主張儲才國外及留學歐洲，充實了復興基地的人力資源。換言之，他曾經身體力行地推動三民主義建設。所以，金氏認為，如果能爭取到季陸先生去出席這一次國際學術會議，就已經是會議的成功。因為季陸先生本身，就可以做「國父思想的證人」，也就是國民革命的歷史。但是季陸先生已經高齡八十，且血糖過高，醫生勸阻其遠行。惟經金博士夫婦運用各種關係一再遊說，又經教育部屢次敦請，季陸先生才抱著一種傳道的心情，勇敢地踏上歐洲旅程。

其次，金德曼還想邀請黨史會主委，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教授秦心波（孝儀）先生及中央文工會主任楚崧秋先生去參加會議，但是由於中國國民黨四中全面的籌備工作，他們兩位均無法成行，但仍提供資料，協助其辦理國父史蹟展覽。心波先生還提出了一篇論文：「中國儒家文化傳統在孫逸仙博士民族革命意識型態中所担任的角色」，請李國祁博士代為宣讀。此外，教育部經與有關方面協商後，還聘請師大文學院院長李國祁博士，淡江學院歐洲研究所長許智偉博士及台大客座教授劉岱博士同去出席此次會議。籌備會方面也請到了當代研究孫逸仙思想的著名學者，如美國的韋慕庭（Prof. Dr. Martin Wilbur）、以色列的史扶鄰（Prof. Dr. Harold Schifferin）、德國的杜勉夫婦（Prof. Dr. Juegen Domes）等人來與會，使在歐洲舉行的第一屆國際孫逸仙先生學術研討會已經可以預卜成功地順利舉行。

（三）史蹟展覽及記者招待會

在文工會、黨史會及國史館的支援下，金德曼搜集了：(1)自一九〇五至一九二五年間與國民革命有關的歷史地圖；(2)自十九世紀中葉起至國父逝世時為止，有關於國民革命及國父史蹟的相片；(3)有關於實業計劃及土地改革之相片、圖畫及統計資料；(4)以西方語文所寫有關於國父及三民主義的著作等；再加上國父的遺像及油畫像等，舉辦了一個「孫逸仙革命史蹟展覽會」，以擴大研討會的影響，並引起各界對研討會的重視。此一展覽會定於十一月廿一日起至耶誕節止，首先在薩爾茲堡主教座堂

的迴廊中展出，接着將運至維也納及歐洲各主要城市的圖書館中去巡迴展覽。

這些資料的複製及運送，黨史會及新聞局，都曾出了相當大的力量，但當這些資料運到慕尼黑以後，却發現他們原來想要的相片都沒有寄去，他們不想展出的相片却都加印運到。原來，德國人的習慣，是在選上的資料底號碼前方打上「X」號，而中國人看到「X」號，却以為是淘汰不需要的部分，於是發生了上述的誤會。經越洋電話聯絡以後，只好趕忙加印，剛巧趕上許博士陪同黃館長啓程赴奧地利時，送到中正機場，當作手提行李拿去。負責佈置的陳沉全博士，更要接下來後率同研究所的助理們，漏夜裝框及書寫標題，總算能在十一月廿二日上午準時展出。並先行舉行記者招待會，再由基金會代表李步夏正式揭幕。

記者招待會上，曾有一位記者是親中共的中奧友好協會會員，他起立質問說：「孫逸仙博士不僅是中華民國的國父，並且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先驅，為什麼這一次討論孫博士思想的學術研討會，只邀請台灣來的專家，而不邀請大陸來的學者呢？」當時，主持記者招待會的魏斯院長就請金德曼博士代為答覆道：「在中共的心目中，孫先生所領導的三民主義革命，不過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前奏。他們把中國的國民革命，曲解成相當於俄國的孟雪維克革命，僅僅是替布爾塞維克革命鋪路的。相反的，中華民國政府則繼承了國民革命的正統，在憲法上明定以孫先生所創立之三民主義為立國原則。且中央政府建台三十年來在復興基地的建設，無論是政治經濟或教育文化，都是以實踐孫先生的遺教為目標。是故，自中華民國來的學者專家，才最能正確地說明孫逸仙主義的理論與實施。再者，任何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均不問參加者來自何處，更不問其政治立場如何，而只問他對門學問有無研究成果，有否被國際學術界所推重的專著或論文。今天我們所邀請的自台灣來的學者們，均具備此種國際聲望，不知今日在中國大陸的學者中，有那一位專門研究孫逸仙主義而具備了上述條件？如果有，我們也可以立即補請！」發問者既然提不出如此人選，只好語塞坐下。其他的記者們則都興趣盎然地紛紛詢問，有關於國父的身世及其對人類思想的貢獻，國民革命的時代背景及其影響等，也有人問到為什

歷三民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等問題。當然，免不了要問到這一次研討會的緣起，及史達尼克基金會的工作範圍等。

四會前講演與國家電台的特別節目

薩爾茲堡大學為使其本校學生及當地知識分子，能對這一次的國際孫逸仙先生學術研討會之意義有所認識起見，曾於十一月十四至十六日，舉辦了三次公開講演。第一次由該校教授喇桑博士（Prof. Dr. Mohamed Rassen）講：「東西文化交流之價值及其應有之準備。」接着兩次則由金德曼博士主講：「十九世紀的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及「自鴉片戰爭至義和團事變期間的中國歷史」，以便他們可以略知中國國民革命的時代背景。

研討會的開幕典禮及展覽會的揭幕儀式，當地各新聞傳播機構均派有記者專題採訪，使素來寂靜的薩爾茲堡冬天，興起了文化活動的熱潮。奧國國家廣播電台文化部主任羅易士博士（Dr. Gerhard Ruis）在聽完了會議的報導以後，還特地邀請金德曼、史扶鄰、李國祁及許智偉至該台製作了一個特別節目，用座談的方式介紹孫逸仙博士的思想及其在中華民國實施的情形。準備在一九八〇年元月全歐聯播的文化節目中播出，對象不僅是德奧瑞等德語國家，並且全歐洲收聽德語節目的人都可以聽到。所以國父思想將因這一次學術研討會愈益傳播，猶如投石水中，其漣漪將一波接一波地逐漸擴大其影響。

五研討經過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二日上午十時正，第一屆國際孫逸仙學術研討會，在我國留學維也納的音樂研究生吳輝舟及張春娟所演奏的琵琶及古筝聲中，正式揭幕。由修道院所改建的薩爾茲堡大學底古老講堂中，擠滿了中外來賓，序樂奏畢，首由該校精神科學院院長魏斯博士報告籌備經過，並特別感謝黃季陸先生能以八十餘高齡，不辭跋涉之苦，親來歐洲與會。他並且讚揚季陸先生為國際學術界所推重的近代史學者，也是孫逸仙先生的見證人，因其光臨，可以預卜本次會議的成功。

接着由輪值担任薩爾茲堡大學校長的該校神學院院長巴梭博士（Dr. Dr. Belaur）致開幕詞，並代表大學，歡迎各國專家及來賓。他在致詞時，強調唯有在東西思想能夠交流，精神文化與物質文明得以平衡，自由民主與社會正義相互兼顧的情形，未來世界才能更蒙天主的祝福，全球人類才能步向光明的明天。繼由金德曼博士說明：「國際孫逸仙學術研討會」之意義與價值後，即請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博士宣讀主題論文：「孫逸仙主義與中華民國之土地改革」，並繼之以發問及討論。

其餘十二篇論文，則分配在兩天半及兩個晚上宣讀及討論。訂的日程是：每天上午九至十二時，下午三至六時，各有三篇論文；晚上八至九時半，各有一篇論文。因第二天晚上是市長宴請全體出席人員，未排研討節目，故第一晚由許智偉宣讀「西方政治思想對孫逸仙主義之影響」之論文，第三晚則由金德曼主講：「孫逸仙之歷史地位及其對世界之影響」後，立即舉行閉幕典禮。由於會議的進行，英文德文並用，且與會者討論認真、發言熱烈，故每一階段的研討，均將時間延長。中午非至一時無法結束。下午不到七時，不肯散會。晚上更延長至十時半，才停止討論。

不僅是出席者從不缺席，連列席者如我國駐奧代表陸以正，德中協會會長約但將軍（Gen. Jordan），退休外交官葛羅賽（Joachim Von Kruse），曾來華訪問的國際法專家法爾霍塔克（Prof. Dr. Werner Pfeifenberger）等，均始終其事，精神令人可佩。並且，蘇聯駐薩爾茲堡總領事，也趕來旁聽，其居心令人難測。所以，這一次的會議，規模雖然不大，但却頗受重視，討論也很深入。會議紀錄由慕尼黑黑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之研究生負責整理，論文集之德文版，已由治由慕尼黑之書商出版，英文版則想在台北出版。每一階段之討論，分由金德曼、杜勉、史扶鄰、許智偉及韋慕庭等人担任。茲按照宣讀之次序，將論文題目列舉於后：

黃季陸，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孫逸仙主義與中華民國的土地改革」。
李國祁，師大文學院院長：「孫逸仙主義與中華民國的土地改革」。
史扶鄰（Dr. Harold Z. Scheffelin）：「希伯來大學教授」。

「孫逸仙博士的護法運動及其在南中國之革命政府。」
秦孝儀，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教授：

「中國儒家文化傳統在孫逸仙博士民族革命意識型態中所担任的角色。」

許智偉，淡江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

「西方政治思想及革命歷史對孫逸仙主義的影響。」

韋慕庭(Dr. Martin Wilbur)，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孫逸仙博士聯俄政策的動機、方法及防範措施。」

韓吉士(Dr. Dieter Heinzig)，聯邦東方研究所所長：

「孫逸仙博士在早期蘇聯對華政策及對第三世界戰略中所担任之角色。」

陳沅全，慕尼黑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教授：

「從五權憲法及現行憲法論調和東西政治思想的孫逸仙模式。」

溫克勒(Dr. Guenther Winkler)，維也納大學教授：

「從西方憲法學之觀點論五權憲法及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

杜勉(Dr. Juergen Domes)，薩爾大學教授：

「從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國民黨改組期間政府與黨部的組織與功能論孫逸仙博士的政治領導方式。」

倪美蓮(Dr. Marie-Louise Naeth)，特里爾大學教授：

「濟弱扶傾的世界政策——孫逸仙博士論中國在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運動中所應担任的角色。」

翁才達(Dr. Juegen Unselt)，海德堡大學講師：

「孫逸仙博士與潘佩珠所領導的越南國民革命運動。」

金德曼(Dr.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慕尼黑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

「孫逸仙博士之歷史地位及其對蔣介石、毛澤東以及第三世界意識型態之影響。」

(六) 民生主義土地政策之由來

中共曾經偽裝成土地改革者，進行顛覆活動。世界各國的土地問題，也往往成爲社會動亂之根源。所以與會人士對民生主義土地政策在中華民國實施情形，極感興趣。且也對：國父土地改革思想之淵源及其曾否受到共黨影響一點，引起熱烈的討論。例如，曾數度來華研究的波洪大學研究員賀伯森(Hermann Halbeisen)，曾著「孫逸仙博士的經濟思想」的張廷弼博士等，均曾提出頗有價值的看法。歸納衆見，可知：國父雖在民國十三年，始正式講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政策，但遠在一九〇四年致公堂重訂章程時，就以其考察歐美社會問題的心得及針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問題，而提出了平均地權的具體主張。一九〇五年，中國革命同盟會軍政府宣言中，更提出了「平均地權」的政綱，并謂：「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爲國民所共享。」凡此主張，均遠在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之前，而中共組織根本尙無影踪之時也。何況，「均富」與「限田」原是中國儒家政治理想中重要的一環。而漢武帝的「限田」，王莽的「王田」，北魏孝文帝的「限田」以及太平天國的「公田」等，也都是我國歷史上實施土地改革政策的先例。至於其所受歐美的影響，與其說受到俄國革命的影響，毋寧說借鑑於德國俾斯麥的集產社會主義。

季陸先生回憶說，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德宣戰並強佔膠州灣後，德駐膠州總督府中主管土地行政之單維廉氏(William Schra-Ber)南來廣州，任：國父顧問，曾以其膠州灣土地改革之經驗，起草廣州市實施土地改革方案。當時：國父曾將其英文稿，交由季陸先生譯成中文。奈因：國父北上，單維廉氏又翻車死亡，致無具體結果。然以後國民政府所訂定之土地法及所實施之土地改革計劃，仍與之一脈相承也。因爲單維廉乃德國土地改革運動的領導者達馬斯克(Adorf Damaschke)之高足，其來青島後即倡議土改實驗，於一八九八年公佈土地增價稅辦法，規定凡人民將土地出售，須以其純益之百分之卅三繳歸政府。又規定凡經二十五年屆滿，由政府重行估價，依照估價所增價格課取增價稅。實驗結果，於防止土地投機及求土地收益分配之合理化，收到相當效果。德國土地改革協會之極力宣揚，得以推廣於德國本土，法蘭克府市首先響

應，於一九〇四年仿行增價稅制，其他城市紛紛跟進。迄一九一〇年，探行者已達六百十二城市之多。英國也於一九一〇年之財政法案中，通過徵收土地增價稅。其他如奧國、捷克、意大利及西班牙等，也先後做行，可見其影響之大。

達馬照克在其「土地改革論」(張丕介教授有中譯本，列入中國地政研究叢書之二)中，反對共產主義與拜金主義而倡議地制改革，且不着重於土地形式上之歸於國有，而主張以地價稅制，收取地租歸於國家，未來增價則完全歸於公享之理論則又係繼承美國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之土地學說而來。喬氏於一八七九著「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書，開始宣揚土地改革理論，並為之遠赴英國及澳洲等地。一八八七年世界土地改革會議召開於巴黎，公推喬氏為名譽會長。在「進步與貧困」一書中，氏曾檢討各種土地公有之理論，而歸結於「土地單一稅制(Single Tax on Land)」之推行。喬氏認為土地私有制之存在，由於土地所發生之地租歸入私囊，是為私人侵奪自然之恩賜，因之發生社會上之種種不平。今如以重稅制使土地所有者不能侵佔地租，則私人失去佔有土地之意義，而國家得有土地公有之實際。當然，喬氏之思想仍以英國大經濟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5)於一八二一年所著「國民經濟學原理」一書為基礎，因其中曾謂：「所有權之基本原理，為對勞動創造及節約儲蓄所加之保證；但此基本原理不能用於非為勞動所創造而為自然物之土地。」又謂：「土地於一定期間內將發生自然增價，此種價值為地主之不勞而獲，應以租稅方式收歸公有。」

綜觀達馬照克、亨利喬治及約翰彌爾之土地改革論，實與國父在民生主義中所提出之「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之辦法完全一致。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公佈土地法後，蕭铮先生曾將之譯載於德國土地改革年報，達馬照克對之極為重視，且加評論。其中並讚譽國父「為東方的偉大改革者」，「孫逸仙博士所說的民生主義亦即全體的生命、幸福與生存」，應為立法者首須實現的思想基礎之。(詳見蕭铮著：「平均地權之理論體系」，中國地政研究所叢書之三，第三〇八至三二六頁)

(七) 聯俄容共之背景與動機

韋慕庭的論文引起了一連串的熱烈討論，歐美學者都很關心：國父為什麼要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中國國民黨到底受到布爾塞維克的影響有多深？

我們可以說，容共是聯俄的必然結果，而聯俄則係迫於當時革命形勢不得不採取的策略，並且國父在採取聯俄政策的同時，還採取了許多防範的措施。

季陸先生提到，革命元老張溥泉先生曾經責備陳炯明不該公布孫先生的密函，而破壞了護法政府的外交，致使中華民國更受列強的壓迫而國勢益危，這種不顧國家安危、影響民族存亡的做法實在是大逆不道。最近國史館從檔案中發現了這三封密函，才知道其中牽涉到一段中德外交的秘史，而且國父也因為聯俄不成，且對美日失望，而只好採取聯俄的政策。

原來，國父於民國六年號召護法而南下廣州成立軍政府，尤其在十年成立國民政府，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以後，南方革命力量逐漸集中，德皇威廉第二曾經及時透過其在遠東的情報人員上海商人曹亞伯(Abel Tsao)與國父聯繫，擬在黃埔附近助我建立兵工廠，並擬以廣州為中心，助我建設鐵路，以加強革命軍的北伐戰力。同時根據德國外交部檔案，當時已先行撥助美金二百萬元作為護法政府的經費，海軍艦隊之得以南下護法，其所需三十萬銀元即係出自此項德援。也因爲有了此種默契，當日本竭力慫恿北洋政府對德宣戰時，國父力持異議，且通電反對。當然，國父之主張聯俄，並非僅由於一時的現實利害，而係立基於通盤的戰略考慮。

在「中國存亡問題」中，國父明白指出，受地理位置的影響，我國在北方之大敵為接壤千里之俄國，在南方之大敵則為早擬將我國變成印度第二的英國。但如歐洲有一強國如德國者之存在，則一方面可以牽制俄國軍隊之南下，另一方面又可迫使英國艦隊不致東來。採取聯俄政策豈不是絕妙的一兩撥千斤底戰略設計？不幸的是由於陳炯明叛變，國父遠走上海，使德日政府失掉了一個有效支持的對象。且密函公布，更使英國惱羞成怒，不僅因短視而支持吳佩孚，且為保持其在遠東的利益，更反對革命

政府。當時，甚至於藉口關稅問題，而黃出了進軍白鵝潭的無耻行動。此一事件，最使國父痛心者，乃是他素來認為「不侵我而友我」的美國，居然也派遣兵艦攻入白鵝潭。而日本也對「大亞洲主義」的呼籲，充耳不聞。非但不肯做安定亞洲的東方王道之城，並且還甘心充當西方霸道的鷹犬，而終於走上了自殺的道路。在這樣的形勢下，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所伸出來的友誼之手，自然對我國朝野都顯得是相當的美麗動人。

民國九年，蘇聯外長加拉罕宣言放棄帝俄時代在華一切特權，且派專使南來聯繫，而當時蘇聯又改採新經濟政策，極類似國父所提倡的實業計劃，使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與革命政府都產生了無窮的希望。為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之民族共同奮鬥，國父樂意採取聯俄的外交政策，但並不是無條件的，更不是要改變他原有的立場與始終信守的原則，所以他先要求越飛與其聯合宣言：「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主義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成功，與完全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勸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民最熱烈的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公元一九二三年元月廿六日於上海）國父鑒於俄國革命不久，對於其今後革命路線無法瞭解，故為消除對蘇聯之疑念，又要求越飛聲明二點併入聯合宣言之中：「為一九二〇年九月廿七日蘇俄對中國通牒列舉之原則，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二為「俄政府現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

國父固執，孫越宣言係出自雙方面的需要，俄以外交國防著眼，國父則以軍援為急。但國父當時以一弱國之在野黨領袖，能堅持原則、不卑不亢，使強國代表作不利於其本國之聲明，不能不承認其為我國外交史上之一大勝利。

其後，國民黨與莫斯科產生了較密切的關係，並任命俄人鮑羅廷為顧問，對黨務自有其重大影響。但聯俄以後之所謂「容共」，乃指准李大釗等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宣誓效忠，致力國民革命。國父當時斷然拒

絕了中共以集體方式加入本黨，且期：①藉本黨之黨綱、政策容納共黨黨員，以消弭馬克思觀念，②以共黨份子之加入，壯大本黨之陣容。是故國父在講演民生主義時還特別批判馬克思主義，指馬克思為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生理學家，我們不應該先穿上了皮大衣再來等候颶北風。且為瞭解蘇聯革命後之真實情形，還特地派遣先總統蔣公等五人組團赴莫斯科報聘。訪問歸來，由於團員間意見不一，致無法提出集體報告，蔣公會單獨上一書面報告給國父，此考察報告之內容對於瞭解當時實情，極為重要。由上可見國父在採取聯俄政策之同時，固已洞燭機先，預為防範。

惟因應邀北上和談，使病逝北京，使國父以人格感化，以主義教導，消融共黨於無形之計劃未能成功。且蘇俄之友我，純係策略之運用，既無誠意，本不可信，致發生離間分化叛黨叛國之陰謀，阻撓革命之進展、延緩民族之復興，殊為可恨。蓋蘇聯之目的，原為引誘我國合作，以消滅逗留於我國東北及西北地區之白俄軍隊，故其除與國民黨合作外，同時扶植江亢虎組華僑義勇隊進兵外蒙，指導李大釗、陳獨秀組織中國共產黨，徐圖赤化中國。且其對華外交對象，原本不是勢力孤弱的國父，而是雄霸中原的吳佩孚，唯因民國十二年京漢工潮事件，吳佩孚識破詭計，大捕共黨，乃轉而南聯陳炯明，直到陳炯明叛變後被眾所棄，才迫於無奈只能跟國父合作。故其在發表聯合宣言以前，越飛還去北京遊說軍閥，其欺騙奸詐，缺乏誠意之情形，固昭然若揭，而聯俄容共政策，也因此先天上，便決定了其必然失敗之命運。

(V) 國父之領導方式及歷史地位

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用功甚勤，鑽研甚深，兼以現代科學方法之普遍應用，常能見人所未見，而有所創新；惟更易因魚魯之誤，表裡之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兼以先入之見而誤入歧途，鑽牛角而無法自拔。此次研討會時，便有人據德國檔案而謂半數德援款項未作明白交待，也有人引同盟會時代章炳麟等人攻擊國父接受日人資助等資料，懷疑國父之品德。但經討論後，眾認德援既經中間人之手，確實匯到國父大本營之數目，尚須查證我國檔案，而革命活動，必須秘密進行者甚眾，暗中支付

之數豈能為外人所盡知，是故甚難以經費收支情形來論斷領導者之品格也。又有人因「國父對革命活動，率多個別領導，直接指揮，甚少透過政黨或政府之正常機構來開展工作，因之推斷「國父缺乏現代管理知識，而純係東方式的人格領導。甚至舉若干命令經由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之手為例，謂其採取家族統治。但此種推理，立即被有識之士所駁斥。因為宋慶齡女士在與「國父結婚之前，原係「國父之秘書，主管命令經由秘書以傳達，豈非事屬正常？且當時之革命環境，始終非常險惡，不僅黨外先受袁世凱的排擠，繼受北洋軍閥的壓迫，而黨內意見也不一致。同盟會時代固被公舉為革命最高領袖——總理，但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之南京臨時政府時代，具有實際影響力的是黃興，故有「孫理想、黃實行」之諺。國民黨成立後，黨人更忙於獵取官位，革命精神盡失，「國父」只能將理事長職讓由宋教仁去代理。在護法時期，兩廣及西南之封建勢力仍根深蒂固，且縱橫捭闔、互爭地盤，又經由反覆成性的官僚政客與北洋軍閥暗中勾結，那裡有正軌的政黨和健全的政府可讓「國父」來領導，他之所以能延續民國命脈於不絕，促使國民革命歷經失敗而成功，完全是靠著他偉大的理想，革命的精神與人格的領導，以及極少數團結在他周圍的忠貞幹部底擁護。所以我們決不應該僅由其當時實際運作的情形來判斷「國父」的領導方式與管理才能；相反的，我們無法不承認：「國父」在既無政權又無軍權的情況下，仍能以主義結合同志，以人格爭取信任，以堅毅不屈的奮鬥來創造時勢，使那麼多的中外志士樂於供其驅策，為其革命理想赴湯蹈火。如果說，這是一種個人領導，豈不是一種偉大的領導！所以季陸先生在結束這一場討論時，曾幽默地引用了戴季陶先生的一首詩：「夢見大佛，雖雲遊七層上天，醒來却仍跪在大佛面前。」以喻吾人不管從那一個角度，去分析「國父」的心理和行為，到最後都不得不欽服「國父」人格的偉大與領導的成功。他真是一位「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的革命聖人，難怪會受到台灣海峽兩岸七億中國人民底永遠崇敬！

金德曼在其結論中，也再度強調：孫逸仙博士不僅為民國之父、革命導師，繼承了中華民族的道統，調和了東西文化的長處，指出了中國現代化的正確道路；並且他也為第三世界的革命與發展，樹立了最佳模式。其

思想學說對未來世界的重要性，將與時俱進、益被證實！

第三國際史

鄭學稼著

定價：五一八元

本書由第二國際之生與死起，敘述第三國際之時代背景，創立經過，各次大會，世界各地共黨之活動，迄斯大林解散第三國際止。書中對共黨路線的轉變以及理論之混亂或錯誤，均做了詳細的介紹和精闢的剖析。

作者曾言：如果在四十年代有這樣的著作，跟毛澤東走的中國知識份子，不會迷信斯大林是一位社會主義革命者，並由斯大林看出中國小斯大林們的臉孔；其真有社會主義理想者，可能由「斯大林國際」的言行，早做出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的結論。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